

性别与空间

——《野草在歌唱》的女性主义地理学解读*

李丹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角度解读多丽丝·莱辛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中性别与空间区隔的关系:由于父权社会里既有的性别分工和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玛丽被局限于女性化的私人空间里;私人空间也再现和强化了玛丽的弱者地位,阻碍了她掌管自我命运的潜能。性别与空间区隔之间互为影响和加强,而非表面“自然”而然的关系。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性别;空间;《野草在歌唱》;女性主义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2)04-0096-05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的兴起,人们对于空间有了新的认识,空间不再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物质存在,不是社会行动的容器,而是“一切公共空间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一切权利运作的基础”^{[1]13-14},也是复杂社会生产的一部分。空间的生产涉及复杂的权力关系运作,而性别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另外,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在西方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关于男女平等、增加女性可见度的观点最终影响到地理学,并要求在地理学科内增加女性地理学者和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女性主义地理学就是在人们对空间的重新认识和女性主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跨学科地理学分支之一。

女性主义地理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空间在女性的形成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男人和女人是否在世界不同地方过着迥异的生活?如果性别属性是社会建构的,那么空间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

色?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如何随着时空的不同而变化?对于女性主义地理学者来说,性别与空间之间不仅不可分割,而且互为构成。

作为地理学分支,女性主义地理学展示女性所遭受的各种压迫“被嵌入物理的、象征的空间和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和其他地理学者一样)时常强调询问在哪儿(asking where,斜体为原文作者强调)的重要性。而该问题的焦点涉及从所谓的世俗空间——厨房、城市公园或者森林——到更具意识形态的空间如领土、国家和地方”^{[2]5}。同时,作为深受女性主义政治运动影响的学科,它也明确强调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性别化”(gendering)作为空间过程、男女性别气质作为空间化的建构的重要性。

早期女性主义地理学“聚焦于对女性所面临的空间束缚进行真实的和形而上学的地图绘制”^{[3]3},并力求显现女性生活。八十年代女性主义地理学进入全盛期,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将“性

* [收稿日期]2012-04-11

[作者简介]李丹玲(1980—),湖北十堰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英国小说研究。

别”当作分析空间进程的重要工具和解释范畴,并探求性别化的公、私空间划分的意义,尤其是该划分在塑造支薪、未支薪工作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有些学者也力图彰显女性作为人造、自然景观参与者的角色。到了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一些观点如“空间是性别化的”“空间不仅反映性别,也生产性别”“性别气质在空间中被空间化地建构”等成为地理学的惯常用语。九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地理学对空间中女性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不再仅仅关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也包括下层阶级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也将性欲特质、性别和种族的“空间化表演”等并非全部属于女性的议题纳入其研究范畴。

总之,女性主义地理学将“空间”和“性别”当做其关键词,其特殊目标在于揭露空间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且“调查、解释并挑战性别划分和空间区分的关系,揭露它们的相互构成,质疑它们表面上的自然特性”^{[4]16}。它不仅为认识性别和空间之关系提供了一种途径和思维方式,同时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向度和可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性别与空间关系越来越多地进入西方文学、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国内,虽然空间批评逐渐得到关注,但是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却几乎依然是批评的盲点。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角度分析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处女成名作《野草在歌唱》中性别与空间区隔之间的互构关系以及二者对于玛丽悲剧的深刻影响。也希望通过本文促进国内相关研究。

一、性别分工与空间区隔

我们知道,父权社会对达到一定年龄阶段女性的角色期待是家庭私人空间里的贤妻良母——“家庭天使”,男性则是公共空间里的支薪劳动者。在这种性别二元对立模式下,空间被划分为公共的、生产的、支配性的男性空间和私人的、再生产的、附属性的女性空间。男性主要在公共空间里从事经济、政治活动;而女性主要在幽闭的私人空间里从事再生产劳动力的活动,让男人保持清洁、吃饱穿暖,准备好每天的外出工作,生育和

照顾担任未来劳动力的小孩,并且成为男性的依赖者。在《野草在歌唱》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二元分工对女主人公玛丽生存空间的建构以及对她在性别化空间里所从事活动的限制。

玛丽生活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属南非殖民地,未婚的她在殖民小镇上过着无忧无虑、自给自足的快乐生活:她拥有一份薪酬不错的办公室秘书工作,工作效率高、能力强,受到老板的赏识;工作之余,玛丽有众多的男女朋友,并尽情享受生活。但是这个三十岁仍然未婚,过着自足生活,并且在公共空间游刃有余的玛丽和父权社会对于女性作为私人空间里贤妻良母这一角色是相违背的。于是在周围人异样眼光和议论下,婚姻问题突然摆在她的面前,让她惊慌失措。为了逃避社会舆论压迫,玛丽匆忙在婚姻市场上寻找结婚对象,将自己嫁给一贫如洗的白人农场主迪克,以此来摆脱困境。

殖民小镇的父权社会就这样以婚姻的方式将具有潜在威胁性的玛丽纳入私人领域;而在玛丽被规训的过程中,显然,她的好友们——主要是她周围的女性朋友——做了父权制的同谋。她们和父权制一起,将玛丽送入对于她来说是牢笼的婚姻,将她规训到父权社会分配给女性的主要空间资源——私人空间——里。可见,女性与私人空间的关系并非自然天成,其背后隐含的是父权制下的性别二元分工。

和迪克结婚后,玛丽来到迪克农场的小屋,正式担当起私人领域的女主人。在到达农场的当天晚上,迪克用托盘端来茶,并且对她说:“但是你现在是你的事情了”^{[5]65}。玛丽顺从地接过茶壶,倒了茶。这极具象征性的一幕代表了玛丽对自己作为私人空间里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现在她在这儿,这个女人,用她的存在装点着他那光秃秃的小屋”^{[6]65}。而对于迪克来说,农场才是他的领域,是他度过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地方:“农场是迪克从此处回去吃饭和睡觉的地方”^{[6]172}。家庭空间仅仅是迪克从公共领域退回后休闲娱乐和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地方。于是大英帝国的乡村殖民地被划分为归属于男性的生产劳动场所和归属于女性的家庭,这两个空间有着迥异的特征。玛

丽的空间主要是迪克的铁皮屋顶小屋,“它看起来幽闭、黑暗而通风不畅”^{[6]63};“在昏暗的黄色光线下,屋子看起来很小,很小;也很矮”^{[6]65}。而迪克的空间则是广阔的农场:栽种着各式作物的数百英亩农田,以及在此劳动、供他驱使的黑人奴隶。玛丽空间的狭小、幽闭与迪克空间的广大、开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对空间资源占有的严重不均也影射了不均等的两性权力。

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工作地和家庭分离的情况下,家庭退化为一个简单的私人化的空间,这种空间结构严重限制了女性的活动。作为家庭主妇,玛丽的主要职责是保持家庭的干净整洁,负责一日三餐,给男人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保证劳动力再生产。但是在南非殖民地,由于廉价的黑人劳力以及作为白人统治者,玛丽从打扫清洁、做饭等家务活中解放出来,仅仅从事被认为“天然”属于女性的女工活,如缝制、修补衣物等。

由于黑人男仆的存在,对于玛丽来说,随之而来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监管私人空间里的黑仆。这被认为是玛丽的特权,迪克一般不越俎代庖。当迪克试图插手玛丽和一黑人男仆之间纷争时,玛丽说:“‘这是我的屋子’”^{[6]95};“‘他是我的仆人,不是你的。不要插手’”^{[6]95}。可以说,玛丽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和在此范围内的权力;但其实作为私人空间女主人,玛丽在自己的领地内并无实质权力,这一点将在后文阐述。

父权社会对女性在私人空间里另一项期待是装饰美化家庭,让男性从户外工作归来后感到舒适和温馨。与迪克婚后初期,玛丽竭尽所能去装饰迪克的简陋小屋,以求博得她的赞扬。她用自己的积蓄买来花布做垫罩、门帘、窗帘,又买来麻布、陶器以及装饰布料,并花了两周时间粉刷墙壁。这使得迪克的“屋子有了明亮的帷帐和图画,于是贫苦阴郁的气息逐渐消失了,有了一种并不奢华的美丽。玛丽努力地工作着,当迪克工作回来注意到每一点新变化时,玛丽寻找着他的赞成和惊讶”^{[6]73}。这些装饰性的家务劳动不仅加剧了家庭内部空间的女性化特质,也强化了玛丽的私人空间归属感,正如麦道威尔所说:“空间不是无生命的,不是社会行动的容器,而是认同构成

里的重要元素”^{[7]16}。

由于被束缚于私人空间,玛丽只能从事一些“天然”属于女性的劳动。高效、能干的她虽然有大把空闲时间,却无所事事,只能把过剩精力发泄在苛刻监管男仆、同男仆争吵等琐屑之事上;或者“白天睡上几个小时,来加快时间”^{[6]158}。迪克也感慨道:“要是她有事情填补时间就好了——那真是麻烦”^{[6]100}。可见,家,对于玛丽来说,虽然“可以依附、安全,同时又受限制”^{[8]45};家如镣铐般钳制了她。

二、性别气质刻板印象与空间区隔

一般说来,社会公认的男性气质是独立、主动、支配;而公认的女性气质则是依赖、被动、从属。这种公认的男女性别气质最终成为性别气质刻板印象,也对男女的空间分属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剧了空间区隔。

在《野草在歌唱》中,玛丽高效、能干,清醒地意识到了迪克的弱点和农场亏损的原因。但她却不愿意插手农场事务,听任迪克自生自灭,希望他依靠自我获得成功:“她需要把迪克——那个她最终所嫁的男人——当做一个自给自足的男人,一个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男人”^{[6]156}。玛丽认为自己从农场的隐退合情合理:“她从农场的隐退是为了挽救她认为他自尊中最弱点”^{[6]157}。可见,玛丽不自觉地认同了社会关于男性作为强者、女性作为弱者的性别气质刻板印象,并按此行事:“现在又有了希望,但她将什么事情都不做,只等着迪克把一切都处理好”^{[6]157}。对于玛丽的被动、顺从,自我放弃,全知叙述者做了如下评价:“她[玛丽]并不是那种主动组织聚会的女人,也不是人群的中心。她仍然是需要被别人‘带出去’的女孩儿”^{[6]44}。

与此同时,迪克也成为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的牺牲品。由于缺乏经营才能而导致农场连年亏损,他虽然意识到玛丽的才能,却由于男性自尊而不愿意玛丽干预、管理农场:“他正准备再次全面接管农场,好像她的管理一直无关紧要,什么也不是”^{[6]149}。迪克的男性自尊也阻碍了他接受玛丽的建议:“他向她征求意见,当她拿起一张垫子,跟着他去农场的时候,他像小男孩般高兴;但是当

她提出建议时,他的脸色由于固执而变得铁青,并开始自我辩解”^{[6]168}。玛丽只能放弃提出建议,任凭迪克固执己见地一次次走向挫折和失败。显然,并非所有男性都具备刚毅、果断、高效等气质,但是社会对于男性作为强者的期待和建构却让某些男性勉为其难,做那些超过他们能力之外的事情,迪克就感到:“他固执己见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好像她鼓励他到超过自己能力所及的深水去游泳,然后听任他自己挣扎着”^{[6]157}。

可以说,玛丽和迪克都是男女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的牺牲品,两人均按照“适宜”各自性别角色的规范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既阻碍了两人在不同生存空间之间自由移动,也强化了空间的性别化区隔。

值得注意的是:男女两性间短暂的空间转换也会带来二者权力关系的转换。迪克由于生病而不得不退回私人领域,并且完全依附于玛丽。玛丽被迫走向公共空间,担负起监督黑人劳力、管理农场的任务,这扩展了她的生存空间。这次短暂的空间越界赋予她在私人空间里所不具有的权力和自信:“这项陌生的责任[管理农场]以及同农场抗衡的感觉都让她兴奋不已”^{[6]136};“给大约八十多个黑人劳力当老板的感觉给了她新的自信;让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是一种不错的感觉”^{[6]138}。随着玛丽权力的增强,她逐渐变得积极主动:“她也正在弄清楚农场的每一个细节:它是如何管理的,种植了什么。迪克睡觉的时候,她花了几个晚上研究他的账簿。过去她对这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这是迪克的事情。但现在,她却在分析数据——只有几本账簿,一点儿也不难——用心去领会整个农场”^{[6]143};“现在,当她随着那群黑人到田地里时,她不停地想着农场,想着该做的事情”^{[6]143}。通过空间越界,玛丽不仅了解了农场,让农场高效运转,甚至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这次空间越界不仅展示了女性的管理才能,也颠覆了以性别为基础的空间划分原则。

但令人遗憾的是,玛丽并没有保持所得权力。她很快从农场隐退,再次任凭迪克自生自灭:“如果她总是和他在一起,总是展示自己较高的能力,

他的防护欲会被激起,最终的结果是,他将拒绝做任何他希望他做的事情。[……]她需要一个比她更强壮的男人,她正在试图把迪克打造成这样的人”^{[6]156}。玛丽最终选择了对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的遵从,并按照“符合”女性气质的“适宜”行为行动。她的遵从让她失去了依靠自我改变命运、挽救自我的机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玛丽意识到自己的被动依赖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悲剧后果:“很久很久以前,当她遇到麻烦、不知所措的时候,她转向另外一个年轻人,一个来自农场的年轻人。好像通过嫁给他她就可以被拯救。[……]她需要独自走自己的路,她想。这是她不得不吸取的教训。要是很久以前就明白了这一点,她现在就不会站在这儿,再一次由于自己对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不应该被期待对她负责——的软弱依赖而遭到背叛”^{[6]248-49}。她本来可以掌管自我命运,避免人生悲剧,正如全知叙述者所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她独立自主,甚至阻止她开着自己的车、在小范围内享受生活。她本可以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人,但这和她的直觉不符”^{[6]143}。

三、空间的再现、强化作用

一方面性别分工、性别气质刻板印象将女性孤立女性化的私人空间里;另一方面,私人空间也再现和加剧女性的依附、从属地位,强化不平等性别权力关系。由于女性被限定于私人空间,她们在此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之经济价值一般不被承认,这使得女性不得不在经济,甚至精神等方面依附于男性。这一点在《野草在歌唱》中也有所体现。

在南部非洲酷热炎炎的夏日里,迪克的小屋如蒸笼般煎烤着玛丽。她多次请求迪克给小屋缮顶,都被他以经济拮据为由拒绝。实际上迪克经常把钱花在可有可无的花销上,对于生活必需品却极为吝惜。玛丽的生命在烈日年复一年的煎熬下走向凋落,孤独、贫困的她希望生一个女儿来陪伴、安慰自己,但是她做母亲的权利也被迪克以贫困——实际上是受伤的男性自尊——为由拒绝了。她对黑人男仆摩西心存恐惧,却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权力辞退他,只能默默承受恐惧、噩梦的煎

熬,在本我与超我的矛盾挣扎中慢慢走向精神崩溃。

可见,虽名为私人空间女主人,玛丽既无权处理私人领域内重大事件,也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只能依附于男性的决定。这正如女性主义地理学者所强调:虽然女性常常被认为是私领域的主角,但不一定是主导;而男性不仅被看做公领域的主角,也是私领域的主导。私人空间“强化了身份,女性的附属性和男性的流动性,”^[9]也强化了玛丽的悲剧。

综上所述,并非女性不具备进入公共空间发挥作用的能力,而是社会关于两性分属于不同等级之空间的意识形态和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生产了女性化的私人空间,并且阻碍女性向公共空间自由移动;而私人空间也再现、强化了女性的弱者地位。最终女性被束缚在狭小、封闭的家庭内部空间里,束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里,失去掌控自我命运的能力。从莱辛的《野草在歌唱》里,我们可以看到性别与空间区隔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互为影响、互为加强;二者表面上“自然天成”的关系,背后实际上是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期待着男、女两性按照各尽其才的原则自由选择各自的生存空间,并且在公、私空间之间自由移动,而非被固着在性别化的空间区隔里,最终成为性别成

见的牺牲品。

[参考文献]

- [1]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7.
- [2] [3] Lise Nelson, Joni Seager, eds. "Introduction."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Geography* [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 [4] 琳达·麦道威尔. 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M]. 徐苔玲,王志弘译.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 [5] Doris Lessing. *The Grass Is Singing* [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8[1950].
- [6] 多丽丝·莱辛. 野草在歌唱[M]. 译林出版社,2007.
- [7] 琳达·麦道威尔. 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M]. 徐苔玲,王志弘,译.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 [8]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宋慧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9] Lorraine Dowler, Josephine Carubia, and Bonj Szozygiel, eds. "Introduction." *Gender and Landscape: Re-negotiating Morality and Space*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责任编辑:朱德东)

Gender and Spa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ass Is Sin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Geography

LI Dan-ling

(School of English,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geography,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and spatial distinction in Doris Lessing's *The Grass Is Singing*; due to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gender stereotypes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protagonist Mary is restricted to the feminized private space; the private space also reflects and reinforces Mary's position as the weak and hinders her potential for self-reli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and spatial distinction is that of interaction and inter-intensification rather than the apparent "natural" one.

Key words: Doris Lessing; gender; space; *The Grass Is Singing*; feminist geography